

晚近经世思潮下俞樾评墨、疏墨论

徐宏勤

(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 在近代墨学复兴的历程中, 俞樾发挥着承前启后的典范作用。一方面, 承乾嘉考据思潮的余风, 俞樾对《墨子》文本进行了详审的校理工作, 促进了《墨子》训诂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 在晚近经世思潮的刺激与“西学墨源”风尚的激荡下对墨学价值进行了重新估量, 主张将其纳入治国安邦的范畴, 彰显了通子致用的理念。对这些言论的深度解读以及校理成果的深入剖析, 可以体察墨学在晚近时期发展和演进的历程与脉络, 可以理解和考量晚近知识阶层在社会危机加重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古典知识以缓释乃至消解社会危机以及西洋新知带来的冲击和紧张, 进而重构知识与信仰世界的心路及价值取向。

[关键词] 墨学; 经世致用; 西学墨源; 校理

[中图分类号] B 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4) 01-0032-09

历经清代朴学的推扬, 墨学终于在考据学人的不懈努力下渐渐拨开历史的阴霾, 拉开了复兴的序幕。及至嘉道之际, 随着内忧外患双重危机的日益加剧, 中国传统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遭遇空前的危机, 也正是这种思想与社会的相互激荡, 使晚近知识人重提诸子学有了真正意义的心情和基础。这是晚近乃至近代以来墨学复兴的大前提, 也是俞樾校理《墨子》文本、阐释墨学义理、重估墨家思想价值的现实背景。不可否认, 作为晚近经学名家, 被视为“为正统派死守最后之壁垒”^[1]的人物, 俞樾的这种思想倾向无疑是现实社会因缘际会下的产物, 然而正是这种价值导向与信实的考校工作切实地营造出一种推重墨学的社会、文化氛围, 为墨学在晚近的复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切实有用”“补弊扶偏”： 实用理念下的评墨

嘉道以降, 随着社会危机的加剧, 学术领域也呈现出变化态势。不少有识之士开始突破锢习为汉、空腐为宋的传统习气, 注重关切国计民生、时局利弊, 进而试图寻求解决困境的良方,

由此使得士林风气中逐渐弥漫着经世致用的思潮。然而, 有别于明末清初的士人以儒学(经学)为理论依据的取向, 此时期的学人已经将先秦诸子纳入了治国安邦的理论范畴。他们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释和评价诸子, 开掘其学说中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种宗尚的导引下, 姚莹、路德、魏源、俞樾等倾向于经世致用的知识阶层开始浸淫于诸子百家。于俞樾而言, 其对诸子各家学说各有所取, 而尤以荀学与墨学接受最多; 于墨家而论, 俞樾尤为关注的是其学说思想的实用性。在《与戴子高》的信中, 俞樾坦言称述道:

仆于诸子, 独喜墨子。其言切实有用, 而文亦反覆详明, 汉人以“孔墨”并称, 想尼山外断推此老矣^{[2]526}。

显然, 这是立足于实用理念对墨家学说价值的肯定和赞许。这种富于推崇之心的剖白基础不再是儒墨相异、墨为异端的传统以儒学为一尊的观念, 而是突破儒学的思想藩篱为墨家正名, 认可了儒墨抗礼比肩并为显学的历史定位, 肯定了墨学切实有用的特征。由清代墨学的发展脉络而言, 俞樾的这种言论基调是对乾嘉时期毕沅等调

[收稿日期] 2023-03-06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重点项目(24NDQN03Z);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244)

[作者简介] 徐宏勤(1988—), 男, 安徽阜阳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诸子学、思想史研究。

和儒墨、汪中倡论儒墨平等理念的延续和发展^①，是墨学发展和接受的新历程，也是诸子学由子儒平等到通子致用嬗变的新特征，更是学术思想在社会危机中的自我调整。

如果说上述的言论倾向是属于宏观上的概述，那在为孙诒让《墨子间诂》所作序文中的论述则不仅具体而微，且凸显了俞樾由对墨子用世之心的称许而升华到对墨子人格与精神的赞颂：

孟子以杨、墨并言，辞而辟之，然杨非墨匹也。杨子之书不传，略见于《列子》之书，不过自适其适而已。墨子则达于天人之理，熟于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战国百余年间时势之变，欲补弊扶偏，以复之于古。郑重其意，反复其言，以冀世主之一听，虽若有稍诡于正者，而实千古之有心人也。^{[3]631}

显而易见，俞樾这里的言论基调仍然是以实用为出发点的。为了彰显墨学经世致用的价值与特征，俞樾首先对杨墨并言的历史现象进行了辨析。关于这一点，历代学者缘于所处时代背景与学术思潮的不同，尤其是个人思想出发点和问题取向的不同而有着相异的观念倾向。如王安石在秉持杨墨执一废百、各得圣人之一的理念基础上，从为学的角度出发，对杨墨之学作了为己、为人的区分，认为：“杨子之所执者为己，为己，学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学者为人，为人，学者之末也。”^[4]由此得出墨子“废人物亲疏之别”“以所欲以利人”，为害天下较之杨子更为“过甚”的观点。而明中叶学人胡应麟在认同王安石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发挥，基于对墨家学说宗旨是与儒家角立而争帝王之统的认知定位上，胡应麟鲜明地指出杨朱“要以自为”的言论旨归较之墨家对儒家学说“昌言以排之、极论以毁之”^[5]的“恣无忌惮”是有着轻重之别的。不言而喻，王、胡二人立论基调虽略有不同，然而是杨非墨的观点是鲜明的、一致的。与这一价值取

向判然有别的是抑杨颂墨观。如被斥为名教罪人且冠以“墨者”的汪中、主张“假道于墨”的路德等即是这方面的代表。由上所言，在乾嘉调和子儒思潮的激荡下，汪中对墨家进行了明确、大胆的肯定，对于杨墨并言现象，汪中明确指出杨朱之学惟贵放逸的特征，鲜明地提出“跻之于墨诚非其伦”^[6]的观点。与汪中观念相似，但避开了学理探讨而关注经世致用的视域不同，路德立足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尤其是当时士大夫外儒内杨、不问世事而自私自利的市俗习气的社会现象，斥杨朱之学乃是“自私自利之道”，而对墨家“爱人济物”“有心于民物”^[7]的思想理念大加激赏，由此提出了“假道于墨”以经世济民、解决社会危机的主张。

审视俞樾的言论，其主旨倾向显然与王安石、胡应麟仅从学理出发、固守儒家正统立场所表现出的“扬杨抑墨”旨归是大相径庭的；而与汪中尤其是同时期稍前的路德在经世致用理念导引下的颂墨旨趣是一脉相通的。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俞樾对孟子杨墨并言而辟之的主张进行了辨析。在俞樾看来，杨朱“贵己”“为我”的学术主张乃是“自适其适”之道，这较之于具有“补弊扶偏”之心的墨子，自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俞樾认为，墨子不仅有着达天人之理、熟事物之情、察时势之变的“能”，又具备反复其言游说世主，以达补弊扶偏之旨的“诚”，于此两点而言，墨子不失为“千古之有心人”。诚然，俞樾这里不仅明确地肯定了墨学，更是对孟子斥墨之辞进行了否定。而这种思想观念的形成与价值取向的定位有着内在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是墨家固有的救世之心及其学说的实用特征；另一方面，也是尤为重要的，即晚近政治危机的冲击与思想危机的迫近，使得如俞樾一般的知识阶层有了重提、新估诸子之学的心情和背景。

基于对墨子及其学说的这种肯定认知，俞樾

① 毕沅：《墨子叙》“‘非儒’则由墨氏弟子尊其师之过，其称孔子讳及诸毁词，是非墨翟之言也……是翟未尝非孔子，孔子之言多见《论语》《家语》及其他纬书传注，亦无斥墨词。”进而指出，孟子斥墨是斥其后学。这一区别墨翟及其后学的试图，显然是基于调和儒墨的用心。较之毕沅，汪中对墨家的肯定和赞许则更为大胆和明确，其认为孔墨二人“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虽欲平情核实，其可得乎？”进而将墨之污孔、孟之污墨归结于“不相为谋而已矣”（《墨子序》）。这里不仅肯定了墨学，而且公然否定了孟子斥墨之论，将儒墨视为完全平等的学派，在当时可谓胆识俱见的石破天惊之论。

进一步对墨家在汉代以降逐渐式微乃至几近中绝的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惋惜:

乃自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传诵既少,注释亦稀。乐台旧本,久绝流传……而墨学尘埋终古矣^{[3]631-632}。

俞樾既以墨家有救世之心,复兼匡扶时弊之能,故而称其与孔子比肩而处。这样的评价已经暗示了,在其看来,墨子及其学说应该被广为传颂和大力弘扬。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墨子》一书随着墨家异端地位的定性和宋明以降标签式的批判,而呈现出传诵者少、注释者稀的现象,以至于“尘埋终古”,几成绝学。当然,对于造成这种“稀”“少”的内在历史因素,作为通古博今的俞樾是不可能不知晓的,但是俞樾并没有予以直言揭示。我们认为,这当然不是其缘由显而易见、无需赘言之故,而是其牢固的儒学本位主义的内在作用,于下意识中采取了保留的态度。他赞同韩非儒墨并为显学的价值定位,并由尸佼“墨子贵兼,孔子贵公”批评,提出两家学术宗尚“其实则一”^{[3]631}的观点,彰显了鲜明的调和色彩。因此,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俞樾对韩愈“儒墨相用”的观点表示称许,认为韩愈是自唐以来唯一“能知墨子者”。而他用墨的理念和准则依然是“以孟子反本一言为主,而以墨子之书辅之”,以希达到安内攘外、拯世救国的效果。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俞樾对墨学肯定和赞许的价值取向仍然没有彻底超出调和儒墨的传统界限。

这种富于传统底色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内涵,使得俞樾对墨学乃至整个诸子学的认知和评述很大成程度上还囿于传统学术的范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立足于现实社会需要对诸子推重的观念和价值取向,说明在当时学术思想界、至少在一部分知识阶层的思想理念中,墨学作为文化“异端”的传统地位得到了根本的改观,曾经被压制在文化专制主义巨大顽石之下的思想正借着时代潮流激荡的东风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点除了上述路德、俞樾等人的论评外,还可以从同时期诸多学人的评述和感喟中得到广泛而深刻的体认:如陕西学者刘光蕢,不但调和汉宋及朱陆之辩,也调和子儒,认为“孟子与杨墨辩,欲用杨墨也”^[8];思想上倾向于维新变革的唐才

常坦言称“欲救今日士、农、工、商各怀私心之病,则必治之以墨学”^[9];姚鹏图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给汪康年的信中,即直言复兴墨学以拯救中国,“墨氏之学不昌,中国无自强之一日”^[10]。这些言论已是对墨学的公开推扬,孕育了墨学复兴的因素。这是墨学得以在晚近兴起和发展的内在动因,也是晚近学术思想嬗变的重要基础。

二、西学之权舆:西学墨源说影响下的识墨

晚近尤其是嘉道以降,随着列强入侵的加剧,西洋新知和思想不断涌入古老的中国,在促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等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也使得中国士人的知识、信仰世界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在意识到不得不选择接受的时候,士人们试图寻找新的资源来摆脱社会困境以及重组自己的知识系统以理解和把握这种新知和思想。可是,此时的知识阶层才猛然意识到,一直居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以及最为读书人所熟练的关于所有知识、思想的诠释方式——经学,似乎已不能提供一个全面理解西洋新知与思想的平台。于是,在重新审视古典知识和思想并将其与西洋新知加以比附的时候,他们发现原来处于思想话语边缘的学问,如诸子学(当然也包括佛学)竟拥有如此之多的致用之术,并能很快地融入到新的语境,得到新的理解。是以,“西学中源”,尤其是“西学源于诸子说”便自然地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其中,墨学因其富于科技、逻辑及宗教等思想特征,极大程度上成为士人接受和引进西方新知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平台,于是“西学墨源”的呼声不断高涨,成为晚近墨学复兴的重要助力。在这种思潮的推扬下,给予墨家学说及其人格精神以同情理解乃至称许、赞颂的俞樾而言,自然有着其相应的体认与价值判断:

近世西学中光学、重学,或言皆出于墨子,然则其备梯、备突、备穴诸法,或即泰西机器之权舆乎!^{[3]632}

这里,俞樾虽然不曾如同时期的学人邹伯奇

等那样通过详审的对比以论证“西法皆古所有”^①，但这种宏观的概述显然同样把墨学视为西方科技的源头了。如上所言，这种观念和价值取向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19世纪下半叶始，随着西洋新知与思想的涌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士子、官员开始走出国门，远涉西洋进行探知与求索。在深刻地感受到世界变化的同时，也使得他们开始在西学的对照下不同程度地反思中国文化。这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西洋世界中所见所闻的器物乃至人伦、政治、习俗等层面，虽不能在传统儒家知识系统中一一印证，却能与诸子学得到暗合。翻阅、检索薛福成的《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张自牧的《蠡测卮言》、王仁俊的《格致古微》以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著作，可以看到大量诸子尤其是墨家学说与西洋新知的比附现象，这显然就是俞樾所说的“或言”的现实背景。与此同时，俞樾对这种观念无疑是持赞许的态度的，其“权舆”的价值判断即是对“西学墨源”说所作的最该恰的诠释。

显然，俞樾（当然也包括同时期知识阶层的部分士人）的这种言说旨归与价值导向，彰显了他们在中西方文化接触与对比中表现出的对先秦古学尤其是墨学极大的自信。他们通过这些相对熟知的旧知识，进而想象和诠释那些陌生的新知识，借助这些已被理解的旧的价值观念，来解释和把握异域他国的很难理解的新观念。同时，更经由这样一些传统资源的媒介诠释，来缓释乃至消解新知识、新思想带来的心灵冲击和震撼。所以，就这一层面而言，对于俞樾及同时期持相同理念的知识阶层而言，墨学乃至整个古代的经典实质上就成了这样一种媒介和资源：它一方面承担着对各种旧知识、旧理念进行维护和延续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充当着使新知识、思想得到理解，并获得合法合理性的武器和途径。

基于这样的阐释理路，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西学中源”思潮激荡下，俞樾的这种墨学体认显然具有多重的价值导向：一方面，墨学成为其想象、理解西洋新知的跳板和媒介；另一方面，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墨学在缓释乃至消解西洋新知带来冲击的同时，维持着“天朝上国”的自尊和脸面。这一点可以在相当多的尺牍材料中由俞樾对西洋新知的态度上得到印证，如在与日本儒官竹添进一的信中，俞樾对竹添进一以周孔之遗法胜西洋新法的观点大为赞许，并进一步补充言道：

鄙意则谓，居今之世，只须《孟子》七篇，便是救时良药，盖孟子时，有善战者、连诸侯者、辟土地者，人人自以为得富强之策，亦犹今人之争言新法也^{[2]585}。

虽然也有学人较早地探究了俞樾文学观在近代社会思潮激荡与推扬下的更新和变化^②，但就整体而言，俞樾的观念是趋于保守的，是在被动顺应时代潮流，以淡漠的态度对待西学的。因此，在西学东渐、中西交流日甚一日的时代，俞樾对西学从未主动吸收，并一再强调西学已在“吾儒包孕之中”。可是，由于他清醒地认识到晚近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故而对于举办“洋务”“新政”的必要性表示理解。也由此，俞樾对于他人乃至自己的弟子学习西学并不反对，甚至表示“苟有能通声、光、电、化之学者，亦佳弟子也”^[11]。这些无不折射出在晚近特定历史条件下、在渐渐渗入的欧风西雨中，知识阶层内心的迫力及其无可奈何的心路历程。

当然，不可讳言的是，从理性的研究视域出发，包括俞樾在内的知识阶层的这种将诸子尤其是墨学与西学比附式的言说和行为，无论是出于致用还是保守理念，都是不可取的。在凸显了他们对西学以及墨学理解的肤浅同时，也反映了

① 邹伯奇通过将西方的科技、宗教乃至行文格式与《墨子》文本加以比附，进而得出了“西法源出《墨子》”的结论，见：徐世昌。清儒学案：第一百七十五卷：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8：6769-6771。

② 赵家莹先生曾指出：“虽然他（俞樾）没能像龚自珍、魏源那样成为启蒙主义思想家，后来也不曾直接去参加维新改良的活动，然而其思想，不但与之同步，甚至有不少还是超前的。”（参见：赵家莹。近代社会思想的变迁与俞樾文学观念的更新[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1）：117-124。

“天朝自尊”的夜郎心理^①。因此,这种言行在当时即遭到学者的反对,如学者徐仁铸对此不以为然道:“近人有牵合比附,谓西人之学悉出中土者,亦涉自大之习,致为无谓。”^[12]而梁启超更是批评道:“举凡西人今日所有之学,而强缘饰之,以为吾古人所尝有,此重诬古人,而奖励国民之自欺者也。”^[13]可谓深刻、中肯。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设想,若不如此,作为浸淫在中国文化习惯中,用传统思维方式思考问题的中国人,又怎么理解那些历史和传统的经验中从未有过的东西呢?而更应注意的是,这一思潮的背后对中国学术格局带来的变化,即诸子学尤其是墨学的复兴^②。在这种言说思潮的推扬下,使墨学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成为广泛探讨和言说的对象,无疑助力了墨学在此时的复兴。对此,栾调甫先生所言:“道咸以降,西学东来,声、光、化、电,皆为时务。学人微古,经传蔑如。《墨子》书多论光、重、几何之理,足以颀颀西学,此其由微而著者。”^[14]诚为不刊之论。

三、乾嘉朴学绪余:《墨子》文本的校理

正如俞樾在《孙仲容墨子间诂序》中所言:“国朝镇洋毕氏始为之注,嗣是以来,诸儒益加饬校,涂径既辟,奥窔粗窥,《墨子》之书稍稍可读。”^{[3]632}信然,自披上异端的外衣,墨家学说不断遭到打压而几成绝学,《墨子》一书也被忽视千余年之久。至清代中期,随着考据思潮的兴起,毕沅、孙星衍、张惠言、王念孙等学人始对其探幽析微,从而为《墨子》重光、墨学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晚近,学人承乾嘉考据之余风继续对《墨子》文本进行考校与诂训的工作,在匡补前人讹误的基础上,将考索与探究推向更为细化的道路。作为朴学大师的俞樾,不仅

有着上述鲜明的墨学观,更有着信实的文本校理与诂训实践。

在《左社文诸子补校序》中,俞樾对自己校释经子的经验曾总结道:“余尝谓治经之道,其要有三:曰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治诸子亦然……治诸子者,必以前后文义、全书体例,悉心参校,而又博观唐以前诸书所援引,订正异同。”^{[3]447-448}这里他所总结的“正句读、字义、通古文假借、以前后文参校、以全书体例参校”等校书路径,正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墨子〉平议》校勘理路与特色的重要线索,下面依次论之。

(一) 正句读:校古书之基础

明句读是准确理解古书通其句义、文旨的前提,尤其在校勘古书时,学者常会因为句读有误而怀疑原书有夺文、衍文的情况,从而导致依据己意擅改文字等错误。《墨子》一书虽不比《尚书》《周易》等经书佶屈聱牙,但向来亦被视为奥义奇文,加之其思想主张不乏“背离”儒家正统者,故学者在校释中常常因成见而致误。俞樾在校释《墨子》时也很注意句读的问题,如《尚贤》中篇:“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句,毕注以第一个“者”字后逗,俞樾反驳云:

“相率而为贤”绝句。“者”字乃“是”字之误,属下读。惟其相率而为贤,是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也。两句皆用“是以”字,古人行文不避重复,今误作“相率而为贤者”,则是民之相率为贤,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之故,于义不可通矣^{[15]95}。

案:俞说诚当。联系上下文可知,此处“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显然表示的是一种结果,而其先决条件正是“民皆劝其赏,畏其罚”。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民众继而相率为贤。俞樾训“者”为“是”,从而使其与“以”构成连接上下文的因果连词,非但合乎古文文法,且使文义

① 近代西方科技及政教与诸子学尤其是墨学有某些表层的相似,然实际上存在着质的区别。因此,“西学墨源”或是“西学中源”说在学理上是不能成立的,这也正是至20世纪,随着人们对西洋新知认识的加深,这一思潮迅速消退的原因了。

② 邓实:“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于是而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参见:邓实. 古学复兴论[M]//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 北京:三联书店,1963:57.)

贯通，故断句诚为允当。

再如《尚同》中篇：“春秋祭祀不敢失时几”一句，毕注断“几”字下读，俞樾驳之云：

毕以“几”字属下“听狱不敢不中”读，解曰：“几，读如关市讥。”然观市与狱讼不当并为一事，殆失之矣。“几”字仍当属上读。几者，期也。《诗·楚茨篇》：“如几如式”，《毛传》训“几”为“期”，是也。“不敢失时几”者，不敢失时期也。《国语·周语》注曰：“期，将事之日也。”是期以日言。不敢失时，并不敢失日，故曰“不敢失时几”^{[15]97}。

案：联系上下文，正如俞樾所言，毕注显然是将“观市”与“狱讼”并为一事而言，已然不类。同时，训“几”为“讥”，变名词为动词，与下句中的“听”构成谓动词的重叠。如此，不仅不符合汉语动词叠用的规则^①，且于义殊为不通。俞樾则断“几”字上读，并以《诗经》《国语》等文本及其训注为据，训“几”为“期”，于义该恰，故其句读实为稳妥可从。

（二）审字义：通古书之古义

《墨子》成书时代较早，加之旧无注释及校本，非但保留着古字古形，且其文字亦兼具先秦古义。俞樾善校古籍，于《诸子平议》之前已撰《群经平议》，在熟悉历代经师训诂思维与方法的基础上，对许多字词在典籍中的稀见古义多有掌握，这种优势在他校释《墨子》时起到显著的作用。如《非攻》下篇“道路辽远，粮食不继，食饮之时”，王念孙校“之”为“不”，诚当，于“继”虽已明了其与上下文不相属的现象，然未能作进一步考论，故阙而未校。俞樾则进一步补充考释道：

今按“继”即“际”字。《张迁碑》“臈正之继”是也。《昭四年·左传》“尔未际”，《孟子·万章》篇“敢问交际何心也？”杜预、赵岐《注》并曰：“际，接也。”疑《墨子》原文本作“粮食不继”，“不继”即不接也，与中篇所云“粮食辍绝而不继”文异义同。后人不达“继”字之义，据中篇改为“不继”，而写者两存之，遂作“不继继”耳^{[15]101}。

俞樾凭借着对经史熟稔的诂训，先以形训，释“继”为“际”，训“际”为“接”。继而又以本校法论证“继”为后人讹衍以致误。如此，不仅使“粮食不继”与“食饮不时”对文而构成一对因果关系，且文通句顺，又合符《墨子》古文古义的特征，其结论可谓精当。

再如《公孟》篇“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毕注于此训“齿”为“年”，非但失之浅显，且数人之年，如何得以为富？于义实为不通。俞樾则结合诂训给出较为允洽的解释：

“齿”者，契之齿也。古者刻竹木以记数，其刻处如齿，故谓之“齿”。《易林》所谓“符左契右，相与合齿”是也。《列子·说符》篇“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曰：‘吾富可待也。’”此正数人之齿以为富者。盖古有此喻^{[15]116-117}。

案：结合上下文，此处是墨子对公孟以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可以为天子观点的驳斥和否定。由此可知，这里的“齿”当是喻指公孟所列的孔子上述诸多才能而言。故而，俞樾通过列举了《易林》及《列子》中的相关记载，训“齿”为符、契刻记之状，正赋予“齿”字符券、契约古义的比喻义。依据其说，则不仅句义贯通，且使人易于接受，诚为允当。

（三）通假借：释古书之真意

除以古义释字词以通句义外，俞樾还特别重视运用古文通假来训释字义。在《群经平议》序言中，俞樾曾言道：“治经之道，大要有三，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三者中，通假借为尤要。”^[16]在朴学思潮的推扬下，清代古音学取得突破进展，从而解决了古代典籍中大量的通假现象，尤其是王念孙提出“因声求义”的理念，明确反对前人望文生义的诂训弊习，这些对俞樾颇有影响。在校释《墨子》文本时，俞樾发现了大量的通假现象，并据此做出了较为可靠的释训。如《备梯》篇“烟资吾池”，俞樾校云：

“资”当读为“茨”。《淮南子·泰族篇》：

① 关于动词叠用的问题，可参见：王力. 汉语史稿 [M]. 北京：中华书局，2004；王晓静. 动词重叠式 VV 的产生和发展 [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6-34.

“茨其所决而高之”，高注曰：“茨，积土填满之也。”是“茨”与“堙”同义。古“茨”字或作“蕡”。《尔雅·释草》篇云：“茨，蒺藜”，《释文》：“茨，本作蕡”，是也。《墨子》书作“资”者，即“蕡”字而省“艸”耳。《说文·土部》：“塗，以土增大道上。”“茨”与“塗”通^{[15]121}。

案：俞樾所列举的“资”“蕡”“塗”在古音中皆从脂部，故常常可相互通假。俞樾通过多个环节，最终将“资”与“塗”联系起来，虽然论证过程看似迂曲，但于文义则是该恰的，不失为的论。《〈墨子〉平议》中此种运用通假的考索还有很多，如《大取》篇“益其益，尊其尊”中，“尊”与“剡”通；《小取》篇“行而异，转而危”中，“危”与“诡”通等等，皆为此类。

但俞樾的校释也有过于侧重通假而使可诂训存在可商榷的地方，《备城门》篇：“然则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中，俞樾校云：

“尊当为遵，古字通也。”^{[15]118}

案：此处承上文文义，乃就守者而言。守者善而君不用，城不能守；守者不善而君用之，则城亦不能守。惟守者善而君尊用之，然后城乃可守，此为文旨所在。故“尊”字于此处正体现君主对贤者尊而用之，也是墨家尚贤思想的彰显，并非遵守之意。故而“尊”虽与“遵”古可相通，然置于此处实为不当，故不可从。这类讹误大概是缘于俞樾的学术性格使然，今人谓其“才华洋溢，好创新而已见甚强”“但有心得，便勇于立说，故时有未备”^[17]。诚非无据。

(四) 俞樾的擅长及“短板”

近现代历史学家陈垣曾将校勘之法概括为4种，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以此衡之俞樾校释《墨子》，可以发现，俞樾所擅长者为本校和理校，而短于对校及他校。先就前者而言，俞樾校书有很强的整体观，每考订一处常结合上下文及相关篇章的内容对句义和结构进行推断、分析。如《七患》篇“故食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一句，俞樾考校云：

“食”乃“仓”字之误，“仓无备粟”与下句“库无备兵”文正相对，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牙也”，“食”字即此文“粟”字，不得据彼而

疑此文当作“食”也。^{[15]94}

案：本章为《七患》篇最后一个论述段落，主要阐释“国备”的重要性，即“仓备粟”“库备兵”“城郭备全”“心备虑”。俞樾通过这一上下文文义相近的关系，同时结合文辞的对偶结构进行考索、分析，从而断“食”乃“仓”字之讹，所论无疑是正确的。再如《节葬》下篇“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俞樾校订云：

“蚤朝”下脱“晏退”二字。“蚤朝晏退”与下“蚤出夜入，夙兴夜寐”对文。若无“晏退”二字，文义未完。《尚贤》中篇、《非乐》上篇、《非命》下篇并有“蚤朝晏退”之文。《尚贤》篇与“夜寝夙兴，蚤出莫如”相对；《非乐》篇、《非命》篇与“蚤出暮入，夙兴夜寐”相对，是其证也。^{[15]102-103}

通过对文的训释手法，同时结合诸多篇章的行文规律，俞樾对此处脱文的论断无疑是允恰的。

除此之外，俞樾在校释中还常结合墨家的相关思想主张以正前人校理之失。如《耕柱》篇“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俞樾云：

《战国策·齐策》“乃使操十金”，注：“二十两为一金。”然则十金为二百两矣。墨氏崇俭，其徒以十金餽遗，不为不丰，毕云“十金”当为“千金”之误，率意增益，厚诬古人，殊为无谓。^{[15]116}

案：理校法向来被视为校勘中要求最高、难度最大而又最危险的做法，使用不当或学识不济，就容易陷于主观武断。尤其是将学派或作者的学术主张运用其中，则多有附会之嫌。然若遇到无古本可据，又必须定其是非之时，只能综合运用文史等诸种知识，据理做出推断。如在此条校理中，俞樾先结合古人度量计算，对十金之数加以考索，继而结合墨家尚俭思想对毕注校改进行了驳斥。这种超出文本的校理，非但显示了俞樾对墨家思想的熟稔，同时也有助于读者理解句义以及对墨家思想的认知。

相对于上述本校与理校的熟稔而言，俞樾校勘《墨子》时于他校与对校上的着力则明显不足。就主观而言，一则俞樾对类书等编钞型文献有自己的看法，不像王念孙那样倚重，比如他认

为：“高邮王氏《读书杂志》精密之至，然喜据《群书治要》改易旧文，不知此书来自东洋，彼国于校讎之学固不甚精，而以改吾中国相传之本，往往得失参半。”^{[3]448}二则俞樾治学重在义理，以为“学问之事莫大乎通经，通经之道，义理尚矣。然义理不空存，必有所丽”^[15]。客观而言，俞樾撰写《诸子平议》时正值战乱，加之去官后生活拮据，难以购得丰富资料以资勘校，可谓是有心无力之境^①。然而凭借着深厚的学识以及丰富的校勘经验，俞樾常能运用本校与理校的方法以弥补其对校与他校的“短板”。如《七患》篇“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句，俞樾校云：

“疾”当为“寡”。为之者寡，食之者众，则虽有丰年不足以供之，故岁无丰也。今作“为者疾”，则不可通矣，盖后人据《大学》以改之，而不知其非也^{[15]94}。

对于俞樾的校理，其后孙诒让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诒让案：俞说未墙，此疑当作“为者疾，食者寡，则岁无凶。为者缓，食者众，则岁无丰”，此上文咸以“岁善”与“凶岁”对举，是其证。今本脱“食者寡”至“为者缓”十字，文义遂舛牾不合矣^[18]。

案：此处“疾”字乃毕刻本之讹误，考之明代《墨子》诸刻本，如《道藏》本、唐尧臣本、髫眇阁等，皆作“为者寡”。此外，“为者寡”“食者众”与“岁无丰”正构成一对因果关系。由此，我们认为俞樾的结论不仅使文通字顺，更与他本相合，是信实可从的。而孙诒让的校释则凭空增出“食者寡”至“为者缓”十字，又以“岁善”“岁丰”对举为证，可谓求之太深，实不可从。这里，俞樾在缺少他本参校的情况下，能得出如此的结论，足见其学识之深厚、校勘眼光之独到。

四、结 语

以上，即是对俞樾在晚近经世致用思潮下的

论墨、疏墨进行的简要梳理和探究。不难发现，作为正统派学人的俞樾，其言论主张，如对原来散在边缘尤其是被当作异端如墨家学说的论评与阐释，仍不能从根本上超出传统思想的藩篱，但在晚近社会危机加剧与思想危机迫近的现实情形下，终于对这些思想学说有了重提、重估的心情和努力。他虽主张以“孟子反本”为救世之准绳，但又充分肯定墨子其人、积极开掘其学说的社会价值和经世济民的现实意义，以期达到通子致用，有益于国计民生；在“西学中源”思潮的激荡下，他将墨家学说与西洋新知的比附，虽不乏流于圆枘方凿、郢书燕说，但在缓解心理冲击的同时，无疑是对墨学中自然科学的正名和推扬；而其对《墨子》文本的校理实践，虽亦存在可商榷处，但在匡补前人讹误的基础上，创获颇多，推动了《墨子》文本校理的可持续发展。这些言说主张及实践成果自然与其个人学术旨趣密不可分，然而更深层的当是缘于思想与社会相互激荡的历史背景，是知识阶层对国家民族以及自身处境的切实感受与认识的转变。由此，通过俞樾的论墨、疏墨，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和结论：晚近之际，作为一直处在传统思想话语边缘的学问，比如包括异端行列的墨学在内的诸子学，已不再仅仅是少数知识阶层对古典的重新发现与阐释的对象，而成为整个知识、思想世界重组的重要资源。缘此，才真正意义上为墨学乃至整个诸子学在晚近的发展和复兴提供了思想背景与心理平台。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 [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12.
- [2] 俞樾，撰. 春在堂尺牍 [M] // 春在堂全书：第五册.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 [3] 俞樾，撰. 春在堂杂文 [M] // 春在堂全书：第四册.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631.
- [4] 唐武标，校. 王文公文集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308.
- [5] 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 [M]. 上海：上海书店出

① 孟琢先生对此多有论述，可参见：孟琢. 曲园老人的学弊与心病——由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谈起 [J]. 中国图书评论，2013（4）：70-71.

- 版社, 2001: 265.
- [6] 田汉云, 点校. 新编汪中集 [M]. 扬州: 广陵书社, 2005: 410.
- [7] 路德, 撰. 怪华馆全集 [Z]. 光绪七年刻本.
- [8] 武占江, 点校. 刘光蕡集 [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4: 53.
- [9] 王佩良, 校点. 唐才常集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336.
- [10] 上海图书馆, 编. 汪康年师友书札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274.
- [11] 俞润民. 德清俞氏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99.
- [12] 徐仁铸, 撰. 輶轩今语 [M] // 湘学新报: 第三十三册. 台北: 华联出版社, 1966.
- [13]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55.
- [14] 栾调甫. 墨子研究论文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140.
- [15] 俞樾, 撰. 诸子平议 [M] // 春在堂全书: 第二册.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0.
- [16] 俞樾, 撰. 群经平议 [M] // 春在堂全书: 第一册.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0: 1.
- [17] 郭鹏飞, 蔡挺. 俞樾《诸子平议·庄子》辨析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5): 27-34.
- [18] 孙诒让, 撰, 孙启治, 点校. 墨子间诂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28.

Yu Yue's Commentary on Mohism under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Statecraft Though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Modern Times

XU Hongq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Huzhou Normal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vival of modern Mohism, Yu Yue played an exemplary role in connecting the past with the future. In the first place, following the trend of textual research during the Qianjia period, Yu Yue conducted detailed proofreading of the text of *Mozi*, promoting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xegesis of *Mozi*. In the second place, under the stimulation of the ideology of “govern the country and serve the society” and the belief that “Western learning comes from Mohism”, the value of Mohism was reevaluated, and it was advocat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categor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ensuring national security, highlighting the concept of universal application.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statements and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s help provide an insight into the evolution of Moh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modern times. They can also help to understand how the intellectual class then, in the context of the worsening social crises, reexamined the classical knowledge in order to alleviate or even eliminate social crises and the impact and tension brought by Western new knowledge, and thus reconstructed a world of knowledge and belief.

Key words: Mohism; serve the society with statecraft; Western learning comes from Mohism; proofreading and organizing

(责任编辑 陈蒙腰)